

# 香港与东亚新帝国主义，1941-1966

[美]杜赞奇

本文旨在专门解读东亚地区的帝国主义嬗变，同时也将其视为自 20 世纪 30 年代迄今为止的一个全球化现象。香港，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表现出了这种基本转变的一种形态。帝国主义主导下其它社会的嬗变鲜有达到香港同样的发展程度，但这些帝国主义的动力学原理却又并非完全迥异。我将要探索的问题之一是，香港的帝国主义嬗变怎样使香港社会变为一个更加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何以至此。

帝国主义形式的改变，是对 20 世纪早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竞争压力以及稍后殖民地或从属地区独立与发展要求的回应。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1932-1945) 清楚地证明了这一变化。虽然一战之后大英帝国深深地承受了这些压力，但是直到二战后，在 20 世纪 50 年代香港脱颖而出成为王冠明珠时，大英帝国才在其已经产生变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嬗变。然而，与此同时，殖民地香港实现新帝国主义理想的契机与冷战的条件相关联。诚然，由于苏联和美国采用新的手段控制其盟友和从属国，冷战本身不过是帝国主义蜕变后的一种表现。

冷战场景营造了有利于香港的新环境。由于远离两个超级大国，而且制衡着中英关系，香港发挥了颇为可观的杠杆作用。身处这样的环境，香港得以摆脱帝国的控制并且在多项经济指标上超越宗主国。就此而论，帝国关系不仅仅是发生了嬗变，而且蜕变成原术语已无法再全面涵盖之物。

## 新帝国主义

相互交战时代是以帝国主义竞争和控制的新环境为特征的：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被新兴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所削弱，同时也受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崛起之民族主义的威胁。当然，在殖民地化世界中出现的民族主义同样也威胁着其它新兴帝国主义竞争者，如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其它国家。这些后起的竞争对手通过建立地域性的地方政权或经济集团来发展新帝国主义，而那些被扶持的地方政权或经济集团往往会在殖民地或从属领土地区上重建名义上的独立自主国家，但在军事上，他们却依赖其操控者。新帝国主义反映了对殖民地外围战略的重新定位，而这种重新定位是帝国统治力量实现称霸全球这一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如一战后阿尔伯特·勒布伦 (Albert Lebrun) 所声称的那样，当前的目标是“使法国和那些同法国关系疏远的殖民地国家相联合，以便整合其力量，构建一个互利互惠的环境。”<sup>1</sup>然而，法国自己却发现很难实施这种新举措。

---

<sup>1</sup> As quoted in D. Bruce Marshall, *The French Colonial Myth and Constitution-making in the Fourth Republi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44. (引自 D. 布鲁斯·马歇尔：《法国殖民理念与第四共和国宪法的制定》，New Haven: 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 44.)

在殖民地和从属地区，随着权利意识的崛起和资源需求的增长，新帝国主义能够更有效地在从属地区建立可间接操控的现代统治机构。其目的是，通过控制他们的银行、交通基础建设和政治机构，来控制这一地区，而这些机构的创立模仿宗主国的同类机构。（比如立法委员会、政治监护机构和类似共产党或满洲国的协和会那样的政党等等。）简而言之，新帝国主义者关注了这些机构的现代化和身份认同。他们通常赞成文化上或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有时包括一些反殖民地的思想意识形态——甚至不惜容忍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同军事政治控制相伴的实际存在。

为了宗主国的缘故，从属国需要得到宗主国的武力保护和经济支持，但是，后者的利益并不一定要求从属国经济与制度落后。因此，帝国主义有时有必要使经济与军事和政治相分离。在一些情况下，宗主国把大量资本和资源注入从属地区，就像苏联与东欧、日本与满洲国那样的关系，因此冲破工业化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传统的二元关系成为首要问题。<sup>2</sup>

英、法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强国早已认识到，在一战冲突与竞争过程中，经济增长的价值，而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殖民地的军队保证和资源供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战后，在英国，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提出的关于殖民地发展和“帝国优先”新重商主义理念更加受到关注。作为殖民地自给自足与战后国内资本需求顽固观念的结果，非常需要得到英国工业的保护，1940年前英帝国对殖民地的支出只有一次攀升到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1%以上。<sup>3</sup>与之相类似的，我们在阿尔伯特·勒布伦的言论中也已经注意到一战后法国对殖民地态度的转变。但是，当法国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在非洲实行帝国优先政策，尤其是贯彻法律和政治权力改革的时候，经济投资和社会发展事业却变得无关紧要了，这种情况直到1946年经济与社会发展投资基金建立之后才有所改观。<sup>4</sup>

1932年满洲国的建立标志着改变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的首次尝试。的确，尤其在满州国建立之后，日本对殖民地的开发，如朝鲜，伴随着生产力高速增长。日本的经济集团，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纷纷建立并且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发展壮大。这类似于德国在新殖民地建立的统治新秩序，其本质上是德国的傀儡政权或

---

<sup>2</sup> See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Boulder Colorado, 2003; see also Duara,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Federalism and the Case of Manchukuo: A Response to Anthony Pagden”, *Common Knowledge*.12.1 (Winter 2006). 47–65. 参见杜赞奇：《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Rowman and Littlefield, Boulder Colorado, 2003; 参见杜赞奇：《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联邦制度与满洲国实例：对安东尼·帕格登的答复》，*Common Knowledge* 12.1 (Winter 2006). 47–65。

<sup>3</sup> Stephen Constantine, *The Making of 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1914–1940*, London: Frank Cass, 1984: 25, 276; Michael Havinden and David Meredith, *Colonialism and Development: Britain and its Tropical Colonies, 1850–1960*, London: Routledge, 1993: 148–59.（斯蒂芬·康斯坦丁：《英国殖民发展政策的制定，1914-1940》，伦敦：Frank Cass, 1984: 25, 276; 迈克尔·哈文登、大卫·梅雷迪思：《殖民主义与发展：英国与其热带殖民地，1850-1960》，伦敦：Routledge, 1993: 148–59。）

<sup>4</sup> D. Bruce Marshall, *The French Colonial Myth and Constitution-making in the Fourth Republic*, 224–226.（引自D. 布鲁斯·马歇尔：《法国殖民理念与第四共和国宪法的制定》，224-226。）

由德国派出军事长官管理。但是，由于整个占领区从属于日本的战争需要，日本的失败也意味着新帝国主义的失败。然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对满洲国和其它殖民地的初次尝试体现了新帝国主义的特征并不完全是被战时需求所驱使，因而更具有实用性。与老牌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例如，1938 年，英国对印度的人均投资只有 8 美元，而日本对朝鲜的人均投资则达到了 38 美元。<sup>5</sup>

我另外对其他地区做了一些关于新帝国主义即所谓“自由国家帝国主义”的研究。在此足以总结出几点：第一，直到 1945 年，苏联、美国和老牌欧洲国家都已经形成了各自特色鲜明的帝国主义理念，这一点我们从 1937 年侵华和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满洲国可以看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发展方面或者满洲国的发展情形，并不是所有二战前帝国主义的共同特征。第二，日本和德国以残暴而臭名昭著，在东欧，德国新秩序并不是建立在鼓吹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日本声称的“亚洲平等”和使“从欧洲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很有影响力，尽管日本侵略者的实际行为与此背道而驰。<sup>6</sup>

当殖民地发展问题进展缓慢之时，英国仍然不得不对一战后新环境所产生的动力学原理做出反应。战时的债务使英国成为仅随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债务国，英镑贬值刺激着英国建立一个经济区。到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越来越需要依靠殖民地资源来稳定英镑与美元之间的比率并保持英镑的稳定流通和平衡债务。1931 年，英国放弃了金本位而另外建立了英镑区，以便实行贸易保护，英国的从属国和其他国家与英镑保持稳定的比率关系，实现货币流通的外部价值。<sup>7</sup>

二战使英国对美国的欠债急速增加，而这种趋势在 1947 年之后表现尤为明显。于是，英国殖民当局便采取了让殖民地向宗主国靠拢的手段，加紧了对殖民地资源掠夺并且控制殖民地的金融。这种手段便是尽可能增加殖民地的出口，以便使英镑外流同时储备美元，而这种方法在 1947 年英镑汇率产生浮动之后发展的尤其迅速。然而，朝鲜战争却导致了英镑进一步贬值。<sup>8</sup>

为此，英国不得已只好实行两项政策。（1）向殖民地引入社会福利政策和发展计划，以便使之准备实行非独立的政治自治。1943 年又成立了社会福利顾问委员会以便给殖民机关提供建议。<sup>9</sup>（2）扩大对殖民地的经济生产部门的投资，包括

---

<sup>5</sup> Sub Park, "Exploit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olony: Korea and India" *Kor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 2003, 19. (萨布·帕克：《殖民地的开发与发展：朝鲜与印度》，《朝鲜政治经济期刊》，vol. 1-1, 2003, 19.)

<sup>6</sup> See Duara,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Federalism and the Case of Manchukuo." (参见杜赞奇：《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联邦制度与满洲国实例》。)

<sup>7</sup> Allister Hinds, *Britain's Sterling Colonial Policy and Decolonization, 1939-1958*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 2001, 11, 29. (艾利斯特·海因兹：《英国英镑本位殖民政策与非殖民化，1939-1958》，格林伍德出版社，Westport, Conn. 2001, 11, 29.)

<sup>8</sup> FO 371/53630, 476 File HKRS 163-1-761. See also Hinds, 121. (FO 371/53630, 476 File HKRS 163-1-761. 参见海因兹，121.)

<sup>9</sup> Tang, Kwong-Leung. *Colonial state and social policy: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842-1997*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Lanham, Md. 1998, 50. (唐 Kwong-Leung：《殖民政府与社会政策：香港的社会福利发展 1842-1997》，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Lanham, Md. 1998, 50.)

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资金保障。我认为这种与殖民地隐形契约体现了新帝国主义在英国的变体。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政策操作起来与殖民地的利益相悖，因为英国没有充足的财力向殖民地推广合适的福利和发展计划。而且，由于利益的冲突，英国限制美元的使用又惧怕美国投资，结果限制了殖民地发展。同时，这一时期政治动荡、独立运动活跃抑制了这种一体化政策。换句话说，政治自治和经济一体化这两个新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之间相互抵触。1955年之后，很明显主要的英镑过剩国家都不乐意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实行自治，如尼日利亚、象牙海岸和马来亚。英国也不得不放弃了原有的帝国计划转而准备于60年代中期全面更换英镑本位。<sup>10</sup>

然而，凯瑟琳·申克（Catherine Schenk）表示，无论何处，也不管什么原因，英国都要继续拥有殖民地，它会紧紧控制或努力控制殖民地货币政策。20世纪60年代香港成为所有殖民地中最大的英镑储备基地。其储量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1亿4千万至1亿6千万英镑上升到1967年10月的3亿6千3百万英镑。这个数目超过了全英国海外债务总额的十分之一。这一增长是香港工业化与殖民货币体系成功联合的结果，其中殖民货币体系需要百分之百的英镑储备。<sup>11</sup> 罗杰·路易斯（Roger Louis）曾经指出，香港和所有的殖民地一样，直到变革的最后几年一直保持着独裁模式，英国的税收和司法管理包括警察力量和边界防卫等方面得到改革，这一模式得以接受。<sup>12</sup>但是，1967年英镑贬值之后，英国主要来自香港的财政支持下降。

申克充分研究了1967年英镑贬值对英国和香港之间殖民关系的影响。首先，伦敦方面坚持英国的特权，单方面地使英镑减值14%并让殖民地承受英镑下跌，使香港这个储备高达4亿英镑的殖民地蒙受巨大损失。而正是由于香港控制了这一大量的储备资金，以及英国军队在殖民地力量的削弱，香港政府因此有了能力进行“反击”，获得了财政自治，改变了香港自身与英国之间的力量平衡。<sup>13</sup>

## 二战日本占领时期，1942-1945

我选取了上世纪中叶，香港在被日本占领背景下，英国新帝国主义的经历。日本对香港的占领，演示了日本占领中国其他地区惯用的模式，并且表现出同样的残酷与手段。同时，香港作为中国独特的一部分，同时作为与东南亚其他欧洲殖民地关联的一块殖民地，在日本战时帝国概念中同样也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欺骗式新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深层冲击，甚至影响到了二战后英

---

<sup>10</sup> Hinds, *Britain's Sterling Colonial Policy* 146, 197. (海因兹：《英国的英镑本位殖民政策》146, 197。)

<sup>11</sup> Catherine R. Schenk, *Britain and the sterling area: from devaluation to convertibility in the 1950s* Routledge London, 1994, 7. (凯瑟琳·R. 申克：《英国与英镑本位区：20世纪50年代从货币贬值到可兑换性》，Routledge London, 1994, 7。)

<sup>12</sup> Wm. Roger Louis, "Hong Kong: The Critical Phase, 1945-194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 1997, 1053. (Wm. 罗杰·路易斯：《香港：危机的局面，1945-1949》，《美国历史回顾》1997年10月，1053。)

<sup>13</sup> Catherine R Schenk,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Hong Kong and the decline of sterling in the 196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II, 3 (2004), pp. 551-580. (凯瑟琳·R. 申克：《帝国回击：香港与20世纪60年代英镑本位的衰落》，《经济历史回顾》，LVII, 3 (2004), pp. 551-580。)

国的政策和对待殖民地的态度。但是，菲利普·斯诺（Philip Snow）的近作，为我的研究带来了灵感，即日本带来的冲击往往被历史编纂学家所忽视。<sup>14</sup> 我研究这种冲击的目的是想证明新帝国主义是一种错综复杂、相互联系、地域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现象。

1941年12月日本入侵之后，带来了在满地区和中国其它地区所确立起来的统治秩序。日本军队和其同盟者在进行了长达几个星期的摧残与蹂躏后，开始转向笼络香港的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并让他们在大亚洲改革主义者的旗帜下与日本合作。<sup>15</sup> 就像起初在满洲国和华中地区建立地方“和平重建”委员会那样，日本在香港也建立了和平重建顾问委员会。<sup>16</sup> 后来在1942年，上述机构被香港的一些领导精英们如罗旭和（Robert Kotewall或Law Kuk-wo）、周寿臣（Chow Shou-son）、何启东（Robert Ho-tung）以及胡文虎（Aw Boon-haw, the Tiger Balm king）等所就任的中国代表理事会和中国合作协会所取代。在这些精英们重新建立起地方协会并将这种势力扩大发展之后，日本继而允许其他由中国人、亚洲人、葡萄牙人和欧洲人建立的各级政体和社会组织成立。<sup>17</sup>

1943年美国领事罗伯特·沃德（Robert Ward）离开香港后不久，记叙了香港被占领的过程，他给我们留下对于日本早期统治印象的记录。他以相当的关注，写下了他所认为香港占领的军事、行政和意识形态的成功。对于沃德来说，日本提出的大亚洲思想是最为重要的，并且也最具威胁。他认为，这种观念有会颠覆欧洲统治世界的传统秩序，正如分析家眼中的穆斯林教派在今天的行为一样，这种观念对于穷苦、受剥削的人们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或许，这种大亚洲主义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或许是，日本军队迫使英国人拖着人力车拉中国人和印度人。对于精英和中产阶级，沃德记录了政府基层组织大量扩张的重要性，通过与1942

---

<sup>14</sup>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菲利普·斯诺：《香港的沦陷：英国、中国与日本占领》New Haven: 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

<sup>15</sup>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I B Taurus, London, 2004, 125-130.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91-102. Se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enemy's techniques of control*, prepared by Robert S. Ward, American Consul, detailed to the Far Eastern Unit, Bureau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Commerce, Dept. of Commerce. Washington, DC 1943, 15-17. Certainly, the Japanese military utilized the Triads extensively. (史蒂夫 Tsang: 《香港近代史》I B Taurus, 伦敦, 2004, 125-130。斯诺: 《香港的沦陷》, 91-102。罗伯特·沃德 (Robert Ward) 宣称日本的暴力行为大多直接针对西方人, 而且日本军队的介入, 是通过慰安妇制度和严格的法律来控制军队的强暴行为的。他同时指出, 在这些年里, 普遍流行的现象是, 三和会和青帮的帮派争斗都宣称效忠于国民党。参见美国领事, 罗伯特·S. 沃德: 《日本占领下的香港: 敌人控制术个案研究》, 具体到华盛顿特区, 商业部, 外国办公署和国内商业局, 远东处, 1943, 15-17。当然, 日本军队有效地利用了三和会。)

<sup>16</sup> 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2005; 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蒂莫西·布鲁克: 《协作: 日本机构与战时中国的地方精英》, 哈佛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Mass, 2005; 拉纳·密特: 《东北人的现实: 民族主义、抵制和合作在近代中国》, 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2000。)

<sup>17</sup> Ward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18-22. (沃德: 《日本占领下的香港》, 18-22。)

年之前英国殖民统治清晰的比较，他认为 1943 年的境况不佳。<sup>18</sup>

在 1942 年之前的体系当中，香港的整个行政事务是由英国官员来管理操作的，并且在行政立法机构中政府委派给华人的席位只有 4 个，地方管理机构或代表机构也没有建立起来。与之不同的是，日本军事政府则在只有 4 个中国人（或香港人）席位的代表机构之下建立了 18 个局，作为“自治政府”行政机构。这些机构由华人担任正副职，有数以百计的华人雇员和领导着多达 3000 管理者。除此之外，主要行业被拥有 22 个华人席位的合作理事会所代理。日本人还重开了因 1925 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失败而被迫关闭的海员和航海联合工会，并且建立了渔业和贸易合作社。到 1943 年，这类联盟组织被重建起来，以便顺应日本政权的意志。<sup>19</sup>

日本建立的 18 个局代表了保甲监督制度和现代动员体制的融合。他们主要负责协助日本政权管理社会治安、食物配给、遣返大陆难民、制定预算和受到同等重视的公共卫生等工作。这种组织结构与满洲国政权的协合式的社会结构类似。与其它地方一样，日本通过派遣日本官员去监督中国的统治机构，从而达到控制这种社会组织结构的目的。在香港，这种统治方式在香港的地方行政机构成立后不久，便立刻在 3 个区付诸实施。香港的地方行政机构直接受到以矶谷廉介(Isogai Rensuke) 为首的指挥部（或称总督部）的管理。尽管日本控制着生死大权，关于委任了大量的华人一事，沃德也不得不说：“当然，他们都应该对日本官员唯命是从，但是交给他们的任务不久就会关乎个人‘脸面’的问题，随后就是自尊问题；他们的自我形象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天皇的良民。”<sup>20</sup>

香港同样被视为要在共荣圈宏伟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样，它将不仅仅是金融中心和贯穿帝国南北中转港口，而且还是人口、文化、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连接枢纽。按照总督的说法，“最终目的是把香港建设成一个贸易中心，在这里来自日本、中国、满洲、菲律宾、印度、马来亚和其它地区的亚洲人都能平等相待，共享和谐与繁荣。”<sup>21</sup> 因此，香港不仅仅是要变成一个集造船、维修、补给和中转于一身的主要中心，而且要成为一个亚洲不同文化交汇处，以便保持他们与日本这个中心的连接关系。中国商人与日本代表之间的会议记录揭示了一个谨慎的兴趣，即前者加入日本帝国可能提供开发东南亚新市场和资源的机会。<sup>22</sup> 而具有嘲讽意味的是，日本帝国及其对香港的控制恰恰在这一环节发生了故障。

在香港的日本军队被分成了中国派和东南亚派。早期的政权建设初期展示了中国派的努力，中国派视香港改革为巩固其在大陆统治的机遇。但随着战争的进展，东南亚派的影响超越了中国派，他们更加关注把香港殖民地视为打入东南亚的港口和补给基地。当战争的诉求压倒其它一切时，军队变得极度需求兵员。日本商业和军队利益粗暴地践踏了地方利益。到 1944 年，宪兵队和三合会再次对平

---

<sup>18</sup> Ward,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18-33. HKN 3/29/1942. (沃德:《日本占领下的香港》, 18-33. HKN 3/29/1942.)

<sup>19</sup> Ward 35, Snow 124-125, and HKN 2/26/1942; 3/2/1942; (沃德 35, 斯诺 124-125, and HKN 2/26/1942; 3/2/1942.)

<sup>20</sup> Ward 35, HKN 3/7/1942; 3/22/1942. (沃德 35, HKN 3/7/1942; 3/22/1942.)

<sup>21</sup> HKN 10/14/1942.

<sup>22</sup> HKN 12/10-12/1942.

民实行了恐怖政策。<sup>23</sup> 大亚洲团结早已被置之脑后，沃德早先的担忧也变得不再重要，并且完全不能实现了。

然而，日本的占领改变了所有的一切。战时反对欧洲种族主义的宣传和随后非殖民化运动使得英国难以维持他们的种族政策和统治机构，即便这种优越感能够再次恢复，英国的“高贵”也只能限定在 50 年代。战后在 1946-1947 年杨慕琦 (Mark Young) 的直接统治时期，尝试了许多改革。1918 年规定的将亚洲人隔离的法律被废除，相互通婚合法化，华人警察得以招募，一些城市议员得以选举，并且得到参与教育、福利、公共事业和城市规划的权力。最显著的是 18 个称为街坊自治政府实体的建立。<sup>24</sup>

当然，街坊的与日占时期的区役所毫不相干。事实上，它们是早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至少 20 年就已经被废除的旧中国的自治机构的重现。在 1949 年，新确立的社会福利官开始力图恢复这些志愿组织，到 1952 年 3 月便已经完全建立起 18 个街坊“福利联合组织”。按照社会福利会的报告，这一系列做法的目标不仅仅是让他们能够自己提供救济和资助，而是让他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建设性服务网络，旨在使他们拥有自己实际的福利和改善。因此，他们将传统的福利观念与现代西方福利观念结合起来。”<sup>25</sup>

事实上，至少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街坊在西方是颇为罕见的现代福利机构。如日占时期的区役所一样，他们代表了古老的保甲监督制度、中国地方精英自发团体和寺院组织的结合体，是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教育的实体，以及沟通政府与民众的媒介。但是，除了政府的鼓励之外，他们得不到政府任何基金，也没有任何权力。他们靠募捐和地方乡绅酬谢捐献，供养自己，颇似王朝时代的村庙组织。<sup>26</sup>的确，引进街坊的时机是，难民数量上升，监视再次发挥重要的功能，特别是对

<sup>23</sup> Snow 89, 149-156, 215-228. (斯诺 89, 149-156, 215-228.)

<sup>24</sup> Henry J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in *Hong Kong: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Edited by Ian C. Jarvie and Joseph Agassi. London: Routledge Kegan and Paul. 1969, 123-125. Snow, 289-295 (亨利·J·莱思布里奇:《日本占领下的香港:社会结构的变迁》引自伊恩·C.贾维斯、约瑟夫·阿加西主编:《香港:社会转变》,伦敦:Routledge Kegan 和 Paul. 1969, 123-125. 斯诺, 289-295.)

<sup>25</sup> CO 1023/126 Social Welfare Office (welfare institution) Report from 1948-1952 (Dept report for the first Four Years 1<sup>st</sup> April 1948- 31 March 1952) 18-20. "Aline Wong's work furnishes some evidence that the District Bureau system was direct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kaifong* system in 1949. In the district of Shamshuipo, for example, the funds left for maintaining of the former District Bureau Forces were immediately converted into the foundation fund of the Shamsuipo *Kaifong* in 1949 when the government proclaimed complet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istrict Bureau Force over the whole Colony." (CO 1023/126 1948-1952 年社会福利事务所(福利机构)报告(1948年4月1日-1952年3月31日的第一个四年的部门报告) 18-20。“艾琳·Wong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区域行政机构体系在 1949 年时直接被合并进街坊体系。例如，在 1949 年，当政府声明对全部殖民地的区域行政机构权力全面责任的时候，在深水埗区，被用来维持前一届区域行政机构权力的资金被直接转入了深水埗街坊的基金当中。”

<sup>26</sup> Aline K. Wong, *The Kaifong Associations and the Society of Hong Kong* The Orient Cultural Service, Taipei 1972, 79, *Tang Colonial state and social policy*, 58. (艾琳·K. Wong:《街坊福利会与香港社会》

付共产党情报人员和三合会的渗透。<sup>27</sup>街坊无疑是对殖民地国家意识觉醒的一种回应，但是它与英国版的新帝国主义相一致：在不增加政府开支的情况下，引进监督与发动的新举措。

## 香港契约

基于多种原因，香港反映了一种与其他英国殖民地不同类型的“隐形契约”。当英国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对其他一些地区放弃帝国统治之时，殖民统治权在香港不仅是加强，而且比英国梦想的还要成功。

这多半要归功于战后的第二任总督——葛量洪（格兰瑟姆 Alexander Grantham）爵士（1947-1957），他预见到香港 1997 年将回归中国大陆。因此，他更多的致力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和平相处并提供经济增长机会，而不是忙于地方和立法建设。与香港被占期间在斯坦利受过关押且以此为耻的杨慕琦不同，葛量洪（格兰瑟姆）的前景规划致力于最终建立一个忠诚于帝国又脱离中国本土的自治体（更加典型的英国隐形契约）。

在葛量洪（格兰瑟姆）的直接统治下，英国精英一旦对当时的政治前景有了更安全的感觉，殖民地的态度也再一次变得清晰起来。民主改革出现了倒退，警察队伍中非当地居民越来越多，欧洲人的“高贵心理”也开始死灰复燃。<sup>28</sup>就像詹姆士·海斯（James Hayes）和其他对殖民地社会有过研究的人所证明的那样，在 20 世纪 50 年代，香港仍然是殖民地社会——远离本土的英国人在香港自视为优等民族而与当地人隔绝。<sup>29</sup>

不过，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环境的改变，殖民观念和决策结构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颇为协调一致。的确，如果没有强烈民族运动，涉及帝国体系内部自治的**绝对**契约由地方殖民政府贯彻。而且殖民地政府似乎对领土也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兴趣。事实上，只要粗略地瞥一眼 20 世纪 50 年和 60 年代充满紧张与讽刺的殖民地政府机关档案，便可以发现，在财政部与大都市主管们进行交涉时，殖民地政府像任何民族主义政府一样，坚定地、成功地谋求殖民地的利益。

<sup>30</sup>

---

东方文化服务，台北 1972，79，唐：《殖民地和社会政策》，58。）

<sup>27</sup> CO 1023/126 Social Welfare Office (welfare institution) Report, 19. (CO 1023/126 1948-1952 年社会福利事务所（福利机构）报告，19。)

<sup>28</sup> Snow, 291-2, 318-26. (斯诺，291-2, 318-26。)

<sup>29</sup> James Hayes, “East and West in Hong Kong: Vignettes from history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in Elizabeth Sinn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Univ of Hong Kong, Hong Kong, 1990, 6-10. (詹姆士·海斯：《东西方在香港：历史和个人经验的映像》，引自伊丽莎白·辛恩主编：《东西方之间：香港社会与经济发展面面观》，亚洲研究中心，香港，1990，6-10。)

<sup>30</sup> BT 64/4562 (Board of Trade doc, 1953-1954). See, for instance, the attached note from the Hong Kong office in Britain to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of Hong Kong which asked for an elucidation on para 6 “to show what disadvantages would result if the Colony walked out of the sterling area. Needless to say I did not get what I asked for.” 476 File HKRS163-1-761 (BT 64/4562 (贸易文件，1953-1954)。参见



为什么殖民官僚主义的态度会发生转变，我不知道这样问是否有益。或许这是一个缺乏基础结构性的毫无规律的态度转变。香港是一个新帝国主义能够实际实现的地方，如果我们假定专业官僚们的确努力为他们的目标而拼搏，他们一定会有在香港获得成功。然而，往往会出现反对宗主国权利的残酷斗争。因此，下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探讨殖民地官员工作条件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和为什么殖民地官员在维护香港利益中反对宗主国当局？

在这里，至少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第一，我不仅关注非殖民化显然杂乱的作用，而且关注多边全球组织和国际协定的出现，因为它们为香港提供全球发展的新标准和新规则。充溢着同样讽刺的是档案中对暴发的前殖民地居民的回应，其名为库瑞奇和洛克内森，来自东南亚条约组织或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他们要求殖民官僚主义者遵从这些标准。<sup>31</sup>第二个因素是指上述新帝国主义矛盾的和必然不明确的目标。新帝国主义在理论上是为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共同利益而设计：它并非一个无收益游戏战略。然而，它在实质上是由帝国主义者操控的，无论何时宗主国总是在压榨附属国。从殖民和地官僚的观点来看，他能够看得更远大，并且有时成功的说服当局，尽管经常并没有说出其理由。

的确，殖民地地方政府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故作沉默。1948年，财政部决定放弃对香港财政的控制，建立一个对殖民地财政和殖民地政府进行磋商和监管系统，包括殖民地办公署审批年度评估和某些重要项目。正如王室顾问律师艾什顿(Ashton)在1956年所披露的，尽管上述情况貌似“财政转移”，但实际上英国财政部对香港财政的控制严厉仍然远远超过对非洲殖民地和斐济岛财政的控制。与其它殖民地不同，这种控制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英国议会上院非法定多数”的缺失。(参阅民族主义者的要求)<sup>32</sup>

但是，艾什顿同样也指出尽管葛量洪(格兰瑟姆)从未要求财政转移，但在实践中，他忽视了整体的磋商和规则体系。年度评估(或预算)必须先由机构投票最终确定才能提交给殖民地公署。下面我们将看到总督如何反对收紧英镑本位制度来保护地方商人的货币利益。艾什顿坦承——实质上，对英帝国而言，由殖民地总督和提名的立法机关进行财政自治比公开的财政转移更有利，因为后者可能会引发激进的政治家进行宪法改革。政府不可能给予“工人阶级和商人阶级不同的选举权和影响力，因为工人阶级可能会借此要求更高的福利待遇，从而会增加政府的支出。”<sup>33</sup>

---

英国香港办公署对香港金融秘书的附加意见，例如，第六条“如果殖民地退出英镑区会产生不利结果，不用说，我并没有得到我所要求的。”476号文件 HKRS163-1-761.)

<sup>31</sup> See the exchanges regarding SEATO in FO 371/ 111883 and FO 371/ 111882. See also 449 File HKRS163-1-711 for the exchanges regarding ECAFE. (参见东南亚条约组织文件 FO 371/ 111883 和 FO 371/ 111882, 又见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449 号文件 HKRS163-1-711.)

<sup>32</sup> CO 1030/392 Financial Devolution of Hong Kong –original regulation 1948 and revisions 1956. (CO 1030/392 香港的财政转移—1948年的原始规章与1956年的修订。)

<sup>33</sup> Ibid. David Faure has a most illuminating perspective on the question of social welfare in Hong Kong. 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Colonial Office in the 1950s urged Hong Kong to spend more of its resources on welfare but that opposition to this expenditure –and increased taxes--actually emerged from

从新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格兰瑟姆/葛量洪的政策是成功的。香港能够使宗主国英国的财政保持活力；就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能够赚取美元，并且在金融市场上为英国公民及公司提供机遇。作为回报，香港殖民地要求获得控制其他金融事务的权力和一定程度上的自治。尽管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双方存在着许多摩擦和伤痕，但是宗主国的统治者和附属地区的精英们的关系还是可以保持平衡的。虽然新帝国主义的成功也许与其必然的制度有关，但是，由于没有来自民族主义者提出超越契约要求的压力，这才是其奏效的真谛。

## 香港与冷战

这就把我们带到香港民族主义弱点背后的历史力量，即冷战。从理想化角度来看，冷战是新帝国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在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都在试图赢得表面上独立自主国家的效忠，实际上，这种独立自主的国家不仅在军事上依靠霸权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也从属于这些霸权国家。当然，历史现实要更加复杂；首先在各个阵营内部都存在着竞争，并且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和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发生之前，英国一直也没有放弃对世界超级大国的谋求。<sup>34</sup>就这方面而言，中苏关系的破裂对世界力量的再分配和达到均衡势必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其次，民族主义通过旨在抵制霸权主义及其策略的不结盟运动这种形式（其说辞可能比其政治更具说服力），不仅在各个阵营内部也在其外部形成了一定的力量。最后，霸权的两极化本身使得像香港这种在两极中充当中间人和竞技场的关键地方成为了两极之间的杠杆。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的主战场从欧洲转移到了东亚。有人可能会说，冷战最激烈的时刻发生在东亚、朝鲜、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地区。1950年之前，美国对英国占领的香港并没有表示出太多的兴趣，因为美国相信香港最终会回归中国。但是随着冷战时局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将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之后，美国开始敦促英国对香港进行控制。一旦香港的安全有了保障，英国的冷战言论便会获得并且香港就可以成为东方的柏林：如果世界还没有落入共产主义手中的话，这座堡垒是必须要坚守住的。另外，保护好香港对于保护英帝国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香港倒向共产主义，势必会导致东南亚的局势动荡从而影响欧洲帝国在那里的利益。<sup>35</sup>这样，殖民地的利益开始纳入“自由”和繁荣的冷战视野之中。

---

the local elites in the legislature. In his opinion, the Grantham regime did not do too badly in having to chart its way between “appeasing their superiors without as much as toeing the welfare-state line”. David Faure,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2003, 35. (同上，大卫·福尔 (David Faure) 对香港的社会福利问题有明确的看法。他的研究揭示了殖民部在20世纪50年代敦促香港在福利方面加大资源投入，但是，实际上，立法机构的地方精英反对这些支出，和增加了的税收。葛量洪 (格兰瑟姆) 认为，政府并没有在规划上完全失误，“仅是遵命稍施福利，便取悦了他们的上司”。大卫·福尔：《殖民主义与香港心理》，香港：亚洲研究中心，2003，35。)

<sup>34</sup> Steve Tsang, *The Cold War's Odd Couple: The Unintende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OC and the UK, 1950-1958* I B Tauris, London, 2006, 10, 194. (史蒂夫·Tsang: 《冷战奇偶: 中华民国与英国的意外合作, 1950-1958》, I B Tauris, 伦敦, 2006, 10, 194。)

<sup>35</sup> Ibid, 60-87. (同上, 60-87。)

1948年马来西亚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叛乱的爆发和1948年越南共产党人成功击退法国的事件成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开端。到1950年，英国在香港的武装力量从以前的几千人上升到3万人。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一直是各方在自由贸易掩盖下进行军事行动的场所。国民党，作为政党，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的特务机构，和岛上的国防部，或分别或同时在香港采取一经常是不协调的一行动。这包括搞阴谋破坏、重建和重整在中国大陆的秘密组织、巩固秘密社团、开设训练中心、积蓄武装力量和进行爆炸性袭击等类似活动。美国的一些部门，比如中央情报局在幕后对这些活动进行操控，另外一些部门，如美国新闻处或美国劳动联盟自由贸易联合委员会等则通过文化部门和劳动团体来开展活动。在香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情报人员则渗透进了香港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秘密社团到娱乐俱乐部，但是其重点在学生组织、教师群体和运输行业的劳动团体当中。<sup>36</sup>

然而，导致香港与柏林有所区别的原因是英国统治者不希望煽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抵制行为。格兰瑟姆/葛量洪希望香港依靠中国大陆而进行发展，以便使香港殖民地能够获得和平发展的环境直到1997年移交给中国。因此，在正式的场合中，他寻求保持中立的政策。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英国当局不会对香港的这些秘密活动进行干预，除非这些活动变得太过明显。<sup>37</sup>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香港实际上成为了冷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争夺和冲突的战场。殖民政府虽然对政治战争不感兴趣，但他们发现经济发展和市场自由的发展可以成为将地方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分离的可靠办法。

的确，不仅仅是因为香港在新帝国主义中的位置，还因为其民族主义的相对薄弱使得香港在世界经济中取得特殊优势，也在自由市场上获得成功。这个弱点很大程度上源自冷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把香港分裂成两派政治力量。此外，殖民政府还否决了杨慕琦1946年提出的将香港发展成一个特殊的民主自治政府的计划。换句话说，在香港，那种经常迫使民族国家强烈谴责内部和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待遇并施加一些严格的经济限制的民族主义激情，不能说没有，但却是相当微弱。比较明显的例子是，香港没有中央银行。作为一个殖民地，香港固然会受到英镑本位的限制，但是与此同时地方殖民政府也能够充分行使自治权，通过平衡中国大陆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来获得巨大的货币优势，从而使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 香港夹缝:非意识形态之意识形态

香港地方政府不仅对香港更加关注，而且也比以前干预的更多。新帝国主义的秘密绝招之一是，即使是在其对殖民地事务进行更多干预及殖民地高度工业化之时，地方政府仍然继续声称坚持实行“不干涉主义”和“转口贸易”经济政策。

就基层建设而言，大多学者都认同香港是非常积极的。大量廉价公共住宅和道路、港口设施、供水系统和其他公共设施的修建是从根本上保证资本主义的发

---

<sup>36</sup> 371/105354; 561号文件 HKRS163-1-909, 581号文件 HKRS163-1-931; Aline K. Wong, 《街坊福利会与香港社会》，106-109; Steve Tsang, 《The Cold War's Odd Couple》，60, 167-175。）

<sup>37</sup> Tsang *The Cold War's Odd Couple*, 165. (史蒂夫·Tsang: 《冷战之临时伴侣》，165。)

展，尤其是廉价公共住宅的修建。廉价公共住宅修建方案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是因为大量沿山坡开垦地和沿海泥潭地的殖民地居民定期会受到大火的毁灭性伤害。1953年发生的石峡尾大火便是最直接的因素。艾伦·斯马特认为，政府的再安置计划主要是为了迎合冷战的需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关注殖民地在一连串大火中对华人的忽视。然而资助和集中的大量廉价住宅却成为廉价劳动力的重要因素，因为他们都在日益增长的出口外向型工厂里工作。<sup>38</sup>

正如我们已经见到，许多学者都一致认为，香港是一个没有福利且不受金融规则制约的地区，这很令人不可思议。然而，规则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政府干预。的确，地方政府要对经济不断进行干预以抵制来自宗主国及国际上的限制。<sup>39</sup>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出现了非常著名的“香港夹缝”。

殖民地官僚意识到香港最有价值的经济遗产是上个世纪殖民统治下产生的地域资本主义力量。由本地银行和地方商人所构建的网络系统使香港保持住了其汇款中转中心的地位，来自东南亚和其它地区的款项从这里输向中国。固然，这种地区网络系统离不开英帝国公司和殖民地机构的支持。如滨下武志（Hamashita）所认为的那样，许多西方大银行积极开展他们的工作并且与中国和东南亚建立联系的手段主要是建立与中国的汇款和贸易网络关系并与其发展成共生关系。

的确，由于他们加入了英镑区，因此这个网络也变得繁荣起来，英镑区保证了货币的稳定并且还保证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英镑区优先获得香港货物的机会。<sup>40</sup>早在1952年英国议会中就出现了抱怨的声音，他们认为廉价的香港货物涌入英国市场会对英国的生产商产生不利的影 响。<sup>41</sup>然而，自从香港企业家们赚取了有竞争力的美元借以巩固了英镑本位的地位之后，英国政府便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限制从香港进口货物了。<sup>42</sup>

在宗主国严苛的英镑本位政策下，殖民地政府积极地保护包括本地银行和商人网络在内的本地商业。因此，香港实行了两种货币制度。一种是，一些大型的

---

<sup>38</sup> Alan Smart, “The origins of public housing in Hong Kong: Cold War geo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colonial pow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AS conference, Boston, March 2007. See also David Faure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27-31; and Manuel Castells, Lee Goh, Reginald Y.-W. Kwok, *The Shek Kip Mei Syndrom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blic Housing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Pion, London 1990. (艾伦·斯马特：《廉价公寓在香港的起源：冷战地缘政治学和殖民地力量的限制》美国科学院学术会议提交论文，波士顿，2007年3月，又见大卫·福尔：《殖民主义与香港心理》，27-31；以及曼纽尔·加斯特尔、李·戈何、雷金纳德·Y.-W. 夸克：《石峡尾综合症：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廉价公寓》，伦敦，1990。)

<sup>39</sup> For complaints from regulators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and UN see 449 File HKRS163-1-711; 756 File HKRS163-1-1199; FO 371/ 111883. (对布雷顿·伍兹体系和联合国的抱怨，参见449号文件HKRS163-1-711; 756号文件HKRS163-1-1199; FO 371/ 111883。)

<sup>40</sup>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9. (凯瑟琳·R·申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9。)

<sup>41</sup> BT 64/4562。

<sup>42</sup>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81, (申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81。)

通常是外国银行和公司执行英国政府规定的英镑本位政策固定汇率；另一种是，香港本地网络执行以美元为标准对换货币的政策，因为这对于香港扮演贸易中心这一历史角色是十分必要的。

从狭义的角度来讲，香港之所以获得国际性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就是因为这种被称为“香港夹缝”的独特结构构成。殖民地在获利于英镑区的同时，香港重要的团体，如地方银行家和商人团体，则增强生产力以避免殖民统治所造成的金融责难。这种依照固定汇率的美元价值与浮动市场的美元价值差额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资本，为的是能在套汇中获得利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资金的流入也为香港的工业化提供了经费，继而出口又给香港赚得了更多的美元和英镑。<sup>43</sup>

香港夹缝的直接代理商和受益人是最初进行转口贸易的当地商人和银行团体。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便已经从欧洲人手里接管了转口贸易。由大船装载从欧洲和美国运来的货物，在这里重新装船，用型号较小的亚洲船将货物运往东亚和东南亚。在战争期间这种贸易骤减，但是，这种转运贸易再度恢复时，范围更大了。的确，让香港商人保留美元收入的 75%（按官方汇率上缴 25%）的要求提醒我们：除非以市价收取美元，否则就会在以美元为主导的转口贸易中被澳门以及其他没有此项限制的地方商人淘汰出局。<sup>44</sup>

尽管香港的转口贸易在朝鲜战争后受到了英美对中国禁止出口政策的影响，然而，香港的商业网络还是能够迂回地绕过这些限制。而且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他们也能够从中国大陆的工业增长和由此产生的工业产品海外贸易中获利，包括从随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尤其是 60 年代经过香港销往海外市场的工业货物出口中。由于美国与中国大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敌对状态，所以中国大陆公司在对外贸易中要求以英镑支付而不是以美元支付。<sup>45</sup>因此，冷战使香港夹缝进一步扩大，由于政治的要求使得英镑按自由市场价兑换而不是由官方汇率决定。

## 结论

本研究专门从宏观上进行探讨，揭示帝国主义的某些紧迫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这样，本文忽视了叙述什么因素使得我们去观察地方团体怎样适应和塑造殖民地社会，就像斯托勒（Stoler）的帝国研究和库珀（Cooper）的《帝国的张力》那样。<sup>46</sup>全面的理解需要这样的叙述加以补充；例如，香港殖民地政府是如何养成对地方的那种效忠和为什么要采取“不干涉主义”这种独特的形式，对于我们理解这一点，地方机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

<sup>43</sup> Ibid, 82-85. (同上, 82-85。)

<sup>44</sup> See Grantham report CO 1030/292;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21-23, 103. (参见葛量洪（格兰瑟姆）的报告 CO 1030/292; 申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21-23, 103。)

<sup>45</sup> Schenk *ibid*, 40-41, 85. (申克 同上, 40-41, 85。)

<sup>46</sup> Frederick Cooper and Ann Laura Stol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弗雷德里拉·斯托勒主编：《帝国的张力：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地文化》，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

与此同时，新帝国主义的结构是不能轻而易举地拆除的。我们看到了当伦敦财政部试图限制香港的自由美元市场时，殖民地政府是怎样积极地保护地方利益的。解释这一现象的一个线索或许是当香港的殖民当局能够成功地抵挡对美元市场的一些影响的时候，它却没能阻止黄金兑换成美元。在香港自由市场中，许多英国公民也在英镑兑换成美元中获利；但是在黄金市场则主要受限制的就是亚洲商人。<sup>47</sup>这说明了殖民地政府也能够成功地使宗主国公民获利。

此外，地方环境离不开全球的发展。或许香港最大的特色是民族主义的缺失，这一点要很大程度上要追溯到支撑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敌对的冷战。如果民族主义在香港是一种积极力量的话，那么殖民地当局恐怕就很难像这样很好地平衡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利益。因为几乎没有哪个民族主义金融当局或中央银行能够忍受这种削弱主权的双重体系的。然而正是这种民族主义夹缝使香港获得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且成为了全球化进程的领袖。在多大程度上，香港经验指向全球化世界的未来？在战后接近 20 年时间内，香港教育体系没有向公民讲授香港的历史和现实，上海的高中历史课本经常不提毛泽东和南京大屠杀，这不足以发人深省吗？

最后，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不干涉主义”这一殖民地信条和“自由”这一冷战意识形态呢？在这些口号背后其实是一种积极选择的干涉战略，以便保证资本家竞争的条件。这些条件并没有造就一个像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普遍享有福利的国家。这些口号同样也转移了新殖民地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关注新殖民地不民主的特征。拥挤在殖民地上膨胀的劳动力，在不健康的条件下，长时间地工作；他们得到的只是最低限度的法律保护和微弱的讨价还价交涉能力。殖民地政府却维持着他们被最大限度利用的条件。这就是赢得冷战的“自由”，它的历史条件就是这样的吗？

（赵洪玮，韩威译）

#### 作者简介：

杜赞奇，美国芝加哥大学 教授。

#### 译者简介：

赵洪玮，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青岛大学 教授。

韩威，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07 级硕士研究生。

---

<sup>47</sup>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118.（申克：《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118。）